

学习贯彻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塑造发展新优势

魏江

浙江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深刻把握、系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持以高标准目标体系引领改革攻坚突破,提出到2035年在科技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并强调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科技创新事业的工作重点。浙江要增强科技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强化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机制优化、治理提升等的系统集成,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基本内涵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浙江要在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亟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浙江路径,持续实现数字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技术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技术跨越,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效能。

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效能,根本上需要提高产业技术跨越和产业全球竞争的市场效能。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产业技术能否跨越,最终要看企业能否把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为市场优势。浙江有独特的市场体制机制优势,依托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机制优化、治理提升等要素的系统集成,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尽快推进科技创新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型。长期以来,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球创新追赶上是走在前列的,今后要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推进制度型开放,构筑起开放创新生态,实现创新要素的全球化流动。

战略效能和市场效能的发挥,要建立在强大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基础上。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加速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建立与数字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文化和制度基础

设施等,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基础性保障。因此,要把基础效能纳入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支撑。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三大效能的路径

一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效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国家创新体系战略效能的核心能力,提升战略效能的关键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的系统集成和战略协同。

具体路径上,首先,要明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定位与布局优化。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使命导向型科技攻关中的功能定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优化各类力量的战略定位、任务范围、功能效应与协同机制,放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集群效应。其次,要发挥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耦合作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既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作用,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以制度型市场来实现两者的耦合协同。再次,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牵引功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与其他创新主体、平台、区域和现实系统集成和创新贯通,有效衔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以及产业创新体系、高校院所科研体系、国际开放创新生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发挥主体作用,保障重大关键领域科技创新过程的畅通有效,破解创新链条的“断层断点”。最后,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组织模式与治理机制,聚焦战略效能,优化资源配置,从行政治理、资源配置、人事管理、绩效评价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改革阻碍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消除“系统失灵”,保障使命导向型战略效能的实现。

二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市场效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技术跨越和全球市场竞争力,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根本。要把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作为根本抓

手,确立企业创新核心地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协同和市场效能提升。

具体路径上,首先,重构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让企业承担起关键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开发的主体作用,通过制度安排创造市场机会,实现技术体制、制度安排和市场需求三者耦合,建立制度型市场,为企业和产业技术跨越提供强力支撑。其次,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以市场效能为导向,整合布局科学发现、技术开发、设计与制造、市场化活动,以需求端牵引人才链、资金链围绕产业链和创新链布局。以“创新平台+领军企业+专精特新”的创新协同模式,协同创新主体优势,激发合作动力,形成创新合力。再次,强力推进创新共同体建设。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突破,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构建创新共同体,打通企业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科学中心、国际科创中心等战略协同,消除不同平台之间协同的卡点和堵点,实现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发展。

三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效能。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新基建,需要建构起以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制度型开放与创新型文化等为底座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撑创新主体之间的低成本、高效率协同。

具体路径上,首先,重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体系。统筹规划、加快建设集约高效和安全可靠的数据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推动分布式硬件基础设施向系统性体系支撑转变。加快新一代人工智能布局,打通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基础平台。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其次,完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体系。基于数字技术、数据治理场景、治理层级经验提炼等系统性规则,以全新区域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整体创新体系变革。深入推进数据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数据知识产权创造、转化和保护机制。再次,加快开放型数字治理机制建设。设

计建设赋能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平台生态、大数据中心和数据算力中心等数字新基建,依靠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参与全球数字产业竞争。通过生态治理和协同共享,推动全球科技要素高水平聚合,强化数字人才、数字企业、数字金融等汇聚发展,实现高水平开放创新。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制度安排

一是进一步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以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构建顶层设计、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破除阻碍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模式。进一步完善领导制度体系、议事协调机制、部署落实机制,形成政策性合力。探索以规则、规划、管理、标准等为基础的制度型开放,提高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二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模式,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市场建设,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补偿机制、协调机制的战略导向,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立足市场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导创新要素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畅通“双循环”,激活“新动能”,聚焦内需培育、强链补链、要素流动等,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三是以数据为核心、场景为驱动,加快推进数据资源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快建设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以数据和信息为关键要素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体系。强化数据治理基座建设,探索平台共治共享机制,重塑全球数字治理格局,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治理保障。构建高质量开放创新生态,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战略,促进创新主体多方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进一步推动全球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知名专家说

李忠杰: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党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十九大以来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领航——从一大到十九大》《党章内外外的故事》《世界向何处去》《走向现代文明》等著作。



李忠杰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物质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言:“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在党军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中,物质条件的缺乏曾经是很长时间的常态,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第二性作用。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孕育于浙江的红色精神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起,1920年,浙江义乌人陈望道用“墨汁当糖”的专注和投入,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这本完成于义乌分水塘村的译作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一年多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顺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将其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并将其称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在红色精神引领下,浙江人民从红船起航,开始书写一段又一段壮丽的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后,萧山衙前就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革命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精神。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中国革命陷于艰难逆境之时,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拓游击新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一块重要战略区域,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孕育了以“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为内涵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历了连年的战争,有大量国土亟待重建。1955年,国民党守军裹挟大陈岛全体居民败退台湾。次年,响应团中央的号召,众多温州、台州青年奔赴大陈岛垦荒。面对满目疮痍、焦土遍地、“危机四伏”的荒岛,垦荒青年发挥“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大陈岛垦荒精神,短短4年间,在岛上新开垦土地1000多亩,修建房屋2000多间,渔业捕捞量增长了6倍……大陈岛改天换地,重现生机。类似的故事在浙江不胜枚举。比如舟山的蚂蚁岛,解放初期极端贫穷,全岛人民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将一穷二白的小岛建设成为浙江沿海渔区乃至全国闻名的渔业先进典型。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土地面积仅为全国1.1%,人口为全国的3.8%,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制约了浙江人民实现幸福安康。为解决生活窘境和实际困难,浙江基层干部群众坚持解放思想,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势,从本地具体情况出发,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创办乡镇企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广大人民群众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在艰苦奋斗中积淀形成了“四千精神”。

发挥精神的引领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优势。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江大地上的人民群众接续奋斗,以能动性的实践为中介,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这是对浙江人民在创造灿烂文明中孕育的精神品格的深刻总结,从广义上说,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同样也是红色精神的组成部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历史的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停止,也不会停止。现代化的进程在一步步推进,改革开放也需要一步步深入。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环境和任务,每一个阶段的改革也必然展示出新的特点。对于当前的浙江来说,构建以“红船精神”为核心的浙江红色精神谱系,更好地弘扬传承红色基因,将为浙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

【本报记者 张竞聪整理】



扫一扫 看视频

孔氏南宗文化生动诠释中华文明五大特性

吴锡标

社科论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就是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明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氏南宗及南孔文化形成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孔氏南宗自南宋初年南渡以来,自觉担负起“衍圣弘道”的使命和责任,筚路蓝缕,一路前行,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最初,因为金兵南下、宋室蒙难,出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一腔热血,孔氏南宗毅然离鲁南渡,由曲阜到衢州,再由衢州到江南各地。大宗南渡舍弃的是祖庙和祖宅,传承的则是文脉和文明。入元之后,孔氏南宗因孔洙让爵,丧失了原有的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与特权。明初由于受王希达事件的连累,孔氏南宗的生活与祭祀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然而,孔氏南宗时刻不忘圣裔身份,谨记衍圣弘道的生命担当,以平民化姿态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普及儒学、传承文明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明中后期之后,由于受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较此前均得到显著提升,孔氏南宗走上了振兴之路。清代及至民国,南宗依旧享受这些优待政

策,有些方面甚至不断提高。进入新时代以来,南孔文化在“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建设中发挥出独特作用,体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孔氏南宗体现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面对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断变革,孔氏南宗始终保持与时代同行的步伐,因时而动,积极有为。康熙末年,五经博士孔兴燾的儿子孔毓均胸怀大志,不愿住在孔府之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毅然前往沟溪经商创业。面对清末维新运动的浪潮,五经博士孔庆仪大胆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将旧式的南宗塾学全面推向社会化 and 近代化,成为新式教育的典范。辛亥革命前后,以共和、民主为主流的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上海文堂书局工作的萧山支孔氏南宗人士孔宪彭,编纂了《初学论说必读》《共和新尺牍》《共和女界新尺牍》《共和新论启蒙》等一系列宣传新思想的教学材料。祭孔大典(孔氏祭典)之所以能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对传统祭孔典礼的大胆改革与创新不无关系。

孔氏南宗和北宗,不仅拥有共同的祖先,而且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首先是家国一致的政治属性。南渡之初的孔端倪投奔抗金大业,体现了孔子后裔深厚的爱国情怀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宏大之举;抗战时期的奉祀官孔繁薰为保护圣像,辗转于浙南山区,最后客死庆元,同样体现了孔氏子孙的爱国壮举。孔洙让爵虽然使南宗失去了衍圣公这一至高无上的爵位,但对于维护南北孔氏家族的和谐,以及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是家族内部的统一性。一方面,“泗浙同源”是南北南宗走上振兴之路。清代及至民国,南宗依旧享受这些优待政

策,有些方面甚至不断提高。进入新时代以来,南孔文化在“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建设中发挥出独特作用,体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孔氏南宗体现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面对社会文化环境的不断变革,孔氏南宗始终保持与时代同行的步伐,因时而动,积极有为。康熙末年,五经博士孔兴燾的儿子孔毓均胸怀大志,不愿住在孔府之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毅然前往沟溪经商创业。面对清末维新运动的浪潮,五经博士孔庆仪大胆改革教育教学模式,将旧式的南宗塾学全面推向社会化 and 近代化,成为新式教育的典范。辛亥革命前后,以共和、民主为主流的新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上海文堂书局工作的萧山支孔氏南宗人士孔宪彭,编纂了《初学论说必读》《共和新尺牍》《共和女界新尺牍》《共和新论启蒙》等一系列宣传新思想的教学材料。祭孔大典(孔氏祭典)之所以能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对传统祭孔典礼的大胆改革与创新不无关系。

孔氏南宗和北宗,不仅拥有共同的祖先,而且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首先是家国一致的政治属性。南渡之初的孔端倪投奔抗金大业,体现了孔子后裔深厚的爱国情怀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宏大之举;抗战时期的奉祀官孔繁薰为保护圣像,辗转于浙南山区,最后客死庆元,同样体现了孔氏子孙的爱国壮举。孔洙让爵虽然使南宗失去了衍圣公这一至高无上的爵位,但对于维护南北孔氏家族的和谐,以及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是家族内部的统一性。一方面,“泗浙同源”是南北南宗走上振兴之路。清代及至民国,南宗依旧享受这些优待政

传承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发扬里仁为美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圣裔在化民成俗中的引领作用,协同促进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四是社会交往。南宗人士以开放的心态,通过与赵孟頫、黄溥、宋濂、魏鹤、余绍宋、徐映璞、郁达夫等名人名士之间广泛而深厚的交往交流,既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同,提升了地位和影响,又增强了使命责任,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孔氏南宗发扬光大儒家主张的“和为贵”思想,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具体表现为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家族的和睦团结、社会的和谐发展。关于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家族的和睦团结,从上文所涉的孔洙让爵、南宗支派以及南北宗之间修谱会族等众多事例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作为圣裔,南宗人士充分利用广大民众“见圣孙如见圣祖”的社会心理,在维护社会和谐安宁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康熙年间三藩之乱之时,磐安一带的山寇活动十分猖獗,孔子第67世孙孔毓周在此危难时刻,自发组织训练民兵,设哨设防,侦察敌情,最终将山寇歼灭殆尽。五经博士孔毓垣对孔毓周“文韬武略,可以捍患,可以安民”的品德和才干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南宗之伟望”。何肯定南宗人士孔兴汤为人耿直,是非分明,办事公道,善于调解乡里矛盾,深受时人信任,所谓“析理最精,而又慷慨刚直,是非疑似,不少假借,人皆敬而畏之。族党中有曲直不分者,得汤片言,无不涣然冰释”。孔氏南宗各地支派中,如孔兴汤这样积极利用圣裔身份,致力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人和事实不胜枚举。

【作者为衢州学院二级教授,衢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之江青年论谈

从三个维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姜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提高城乡规划融合的系统性思维,城乡建设融合的协调性思维和城乡治理融合的创新性思维,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让城乡共同繁荣的美好画卷早日成为现实。

规划为基,绘就城乡融合“同心圆”。科学规划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龙头,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城乡总体规划的统筹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长久以来,城乡之间在规划上的割裂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均、发展失衡等诸多问题,例如城市的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规划相对完善,而乡村则相对薄弱,城市教育和医疗资源丰富,乡村则相对匮乏等。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坚决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规划模式,从全域角度进行统筹布局,使城乡在功能定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相互衔接、协调互补。首先,要将城乡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以此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与协同发展;其次,要充分考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在规划过程中,以科学统筹的方法为手段,进行系统合理的布局,持续推动三者有效衔接和相互促进,形成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建设为本,打造城乡融合“新引擎”。基础建设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要坚持协调性思维,高质量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逐步建立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务网

络。这一重要指示高瞻远瞩、立意深远,为我们深刻揭示了基础建设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核心价值。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与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着显著差距,导致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农村发展。要打破这种局面,一方面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更加顺畅的通道;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农村的基础建设,吸引城市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向农村回流。此外,还要通过制度建设更好地为城乡融合发展服务。一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激发农村的经济活力;二是完善强农惠农富农的支持制度,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和扶持力度,促进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高效升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治理为要,筑牢城乡融合“稳定器”。有效治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保障,要坚持创新性思维,高效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的现代化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城乡治理新模式,不断推进城乡治理现代化。例如,在一些乡村地区,通过建立“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党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一些城市社区搭建起居民协商议事平台,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形成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好氛围;还有不少地方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打造“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实现了对城乡社会运行的精准感知、智能决策和高效管理。我们要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做好转化推广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创新城乡治理的制度化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新论